

在

朱东安

文

名誉主编/陈建功 主编/傅光明

聆听大家

学

雷 颐

馆

听

张 帆

讲

座

杨天石

悲情晚清四十年

LINGTING DAJIA BEIQING WANQING SISHINIA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在 文 学 馆 听 讲 座

聆 听 大 家

杨天石

张帆

悲情晚清四十年

雷颐

朱东安

名誉主编/陈建功 主编/傅光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聆听大家·悲情晚清四十年 / 傅光明主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9 .5

(在文学馆听讲座)

ISBN 978 - 7 - 5396 - 3079 - 3

I .聆… II .傅… III .中国 - 近代史 - 研究 - 清后期

IV .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5474 号

聆听大家·悲情晚清四十年

名誉主编 陈建功

主 编 傅光明

责任编辑:刘 哲 吕冰心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瑞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16.5

字 数:320,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3079 - 3

定 价: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那四十年悲情的历史(代序)

傅光明

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从1911年辛亥革掉大清朝的命往前推四十年,即晚清四十年,历史的纪元刻在1871年。这一年曾国藩已至垂暮,第二年,便以六十一岁终年辞世。也就是说,晚清四十年刚一开场,他就从历史舞台上谢幕了。但对于晚清四十年,他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承上启下的人物。

历史是有滋味的,而要咂摸出其中的真味道真需要耐心咀嚼与反复回味。

1870年秋,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被调职。李鸿章接任了有“总督之首”之称的直隶总督,开始进入晚清权力的中心。几个月之后,朝廷决定撤消以前专职的“三口通商大臣”,改由直隶总督兼任。这样,弟子一下子便超越了师傅,从“地方官”跃登国家的外交舞台,参与制定和实施大外交,逐渐成为后来习惯称之的“外交部长”或“国务卿”。晚清汉臣中能享有如此高位重权者,李鸿章是第一人。

曾国藩与李鸿章是一对师徒,能力出众却心性高傲的李鸿章,若非师傅大度能容、力荐提携,又逢时运,是否能上得历史的台面施展拳脚,不得而知。师徒俩不仅在人生事业的奋争竞逐上时有相似,在政治的旋涡中身处夹缝甘苦自知的境遇常如出一辙,就连生命的落幕都一样充满了悲情,身后又一样遭致谩骂、诟病,背上“刽子手”、“汉奸”、“卖国贼”等一系列盖棺论定的历史罪名,九泉之下难得清静。

简言之,历史就是过去的人和事。而历史从来不是僵死的,它只是沉沉

地睡着了,几乎听不到脉搏的跳动和轻微的喘息声。只有触摸,才能进入。深入挖掘历史的人与事,才能激活历史,并使之具有张力。细节尤为重要,虽然细节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全部,但没有繁复细节的历史,无疑是没有生命力的历史。细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历史的时间不会具有先天的巧合性,但不妨事后诸葛亮般地用时间来勾勒历史的轮廓。历史的轮廓不仅可能会变得清晰起来,重要的是,会发现历史的人与事在时间的巧合上似乎真的就是先天注定了的。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卸任与接任“直隶总督”,发生在1870年到1871年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像这样的巧合,应该有理由相信,两者间存在着内在而复杂的逻辑关联,只是我们有可能不知藏而不露的秘密。

也正是在1871年,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日本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修好条约》、《通商条约》,这实则是虎狼之心的日本人于羽翼未丰时的缓兵之计。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海军将李鸿章亲手创建的北洋海军战败,他真正开始了为清廷充当“裱糊匠”的苦日子。三十年后的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奕劻代表清政府正式签订了以中国赔银四亿五千万两为主要内容的《辛丑条约》。整整两个月后的11月7日,老迈抑郁中的李鸿章因病去世。

有趣而令曾、李师徒俩意想不到的,是一个世纪之后,曾国藩的“教子之法”,李鸿章的“为官之道”,伴随着“国学”虚热和官场“厚黑”,徒增了热度。不过,这样一来,也使后人对他们悲情的历史遭际徒增了复杂的心绪,发现给历史人物下结论还真不能像合上棺材盖儿那么简单。另外,随着近年来对历史不断地“戏说”、“大话”,“草根”史家浮出水面。与书斋里正襟危坐的“信史”家们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根”走笔出来的“史”,变得好看、有趣和鲜活了。

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认为:“一件历史事件不能从它的背景下孤立出来,正如葱不能从它的外皮下脱离出来一样,因为一件事的本身就是许多背景的组合,其中没有一件将会再度发生。”他进而指出:“史实的搜集,对于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证据的检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科学的,但是对于那些事件的因果的发现却并不是如此。甚至在研究一件有关的史实都比较清楚的

事件(如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史实)的时候,也不可能正确地考察两千五百万不同的人的心理状态,因为这两千五百万人——除了几百或几千人外——的生命和动机都被埋葬在为人完全遗忘的黑夜里了。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法国革命的原因作一个完整的或全部真实的叙述。”

对于晚清四十年来说,当然也是如此,应该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晚清四十年做一个完整的、全景的真实叙述,但的确应努力把其中人与事里“许多背景的组合”挖掘和呈现出来,而非简单、肤浅甚至盲目、武断的因果。

不妨截取雷颐先生笔下李鸿章的具体个案来看晚清。当失势后的李鸿章从欧美风光出访回朝,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详谈了亲眼目睹的欧美繁华与强盛,且有的放矢地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他的远见卓识不仅未引起重视,更没有如愿地被重新重用。1896年10月24日,他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名衔挺大,却只是个无实权的见习大臣,被戏称为“伴食之宰相”。从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落到“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巨大的失落感可想而知。李鸿章对此自然十分不爽,拖了八天才去上班。可就在任命他的同一天,朝廷接到了有人打来的说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下旨的小报告,对他加以严责:“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着交部议处。”吏部已准备好几天后将他革职,光绪甚至拟下旨:“罚俸一年,不准抵销。”真是宦海艰险!

与此同时,正值康有为、梁启超勃兴维新运动。对于维新,李鸿章心下不无同情,但他毕竟深历宦海,老谋深算,知道参与维新必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争,恐到时想自保都难。另外,他与支持维新的重臣翁同龢之间积怨多年,加之甲午战败,遭朝廷冷落,地位已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紧急政治关头,只要不危及自身的政治前途,打定主意力挺维新派。因此,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有私交,将此书告李鸿章,李鸿章回信,一方面表示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同年8月,为进一步推动维新,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李鸿章自愿捐金两千入会,却因此时名誉受损遭拒。后来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但一方面,他可以捐金支

持“强学会”，另一方面，他对与翁同龢的恩怨始终耿耿于怀，尤其对甲午战后遭“帝党”官员抨击一直心存报复。所以，他又暗中指使人上疏抨弹帝党骨干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的一个。慈禧见此，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录用。慈禧意在打击和削弱帝党力量，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对光绪最忠的官员，这样做，也算杀鸡儆猴了。李鸿章出手也够狠的，从中不难看出，他是既支持维新派，又为“泄私愤”而打击维新的坚强后盾——“帝党”。政治的凶险与人性的复杂在此处已历历在目了！

李鸿章暗中支持康、梁维新不仅有思想，还有具体行动。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史称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李鸿章，李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的事告诉了康，意在提醒康谨慎留神。另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被同时召入。荣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若皇上听从必有大害；同时，他说李鸿章“多历事故”，应能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当即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后又将此事密告给康有为。

我喜欢阅读品味这样复杂细密到精致入微的历史，这无疑是活的历史。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指出：“人们对艺术的认识永无止境，总有新的东西尚待发现。面对伟大的艺术作品，似乎每看一次便呈现一种面貌，它们似乎跟活生生的人一样莫测高深，难以预言。那是它自己的一个动人心弦的世界，有它自己的独特法则和它自己的奇遇异闻。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因为谁也没有臻于此境。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欣赏那些作品，就必须具有一颗赤子之心，敏于捕捉每一个暗示，感受每一种内在的和谐，特别是要排除冗长的浮华辞令和现成套语的干扰。由于一知半解而引起自命不凡，那就远远不如对艺术一无所知。误入歧途的危险确实存在。”

对历史的认识，难道不是这样吗？！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请来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几位专家学者，围绕晚清四十年，设题开讲，于是有了朱东安先生的“近代史上的曾国藩”系列三

讲:《曾国藩与传统文化》、《曾国藩与湘军》、《曾国藩与洋务运动》;有了雷颐先生的一讲:《历史漩涡中的李鸿章》;张帆先生的两讲:《历史“常态”下的百年中国海军》、《颐和园与北洋海军》,以及杨天石先生的一讲《戊戌变法始末》。

晚清四十年是复杂的历史人物频出、复杂的历史事件频发的时段。随便说一个历史人物,似乎都是费尽史学家的唇舌难以澄清,只说这里讲到的,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光绪、慈禧太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对他们的各种言说争论至今不休;随便说一个历史事件,又似乎都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发生、发展及过渡、转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也只说这里讲到的,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甲午战争”,等等,对它们的各类评价论争始终不断。这该是历史吸引人的地方!

我很欣赏张帆先生所说,历史,应当回归常态。其实,这里呈现的七篇演讲,都试图在呈现“常态”的历史,至少是做着这样的努力。

我还十分赞同张帆先生所讲,我们往往特别愿意记忆历史的结论,而不太愿意正视它的复杂性。其实,复杂性才是历史的根本属性之一,真实的“历史的味道”就蕴含在它的复杂性中。搞过十余年口述史“田野作业”和口述史理论研究的我,对此感同身受!

悲情的历史势必造就悲情的历史人物,反之亦然。

晚清注定是悲情的,曾国藩、李鸿章们,也一定是悲情的。

最后,我要再次向书中的四位主讲人致谢、致敬。他们都是治学严谨的学者,都有挖掘史料、深入研究的过硬功夫。像朱东安、杨天石两位史学界前辈,更是积数十年之功力。雷颐、张帆二位,亦是活跃在学界的学术中坚。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独立的思想。正因为此,晚清四十年在他们笔下变得活脱脱有生气了。还是那句老话,敬请各界朋友常来文学馆,聆听智慧,感受讲座。

2009年4月22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录

那四十年悲情的历史(代序)	0	0	1	◎傅光明
曾国藩与传统文化	0	0	1	◎朱东安
曾国藩与湘军	0	2	5	◎朱东安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0	9	7	◎朱东安
历史漩涡中的李鸿章	1	2	1	◎雷颐
历史『常态』下的百年中国海军	1	7	7	◎张帆
颐和园与北洋海军	2	0	1	◎张帆
戊戌变法始末	2	2	7	◎杨天石

曾国藩与传统文化

朱东安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朱东安先生，大家欢迎。

朱先生是在文学馆讲《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的雷颐先生的同事，论年龄，也是雷颐的师字辈，今天请他讲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有这样一句俗话，说“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常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大清朝只此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绩卓著；第三，保官有道，历经宦海风云，荣宠不衰。说他对中国历史烂熟于心，吃透了为官之道，并提炼出一整套曾门的官场绝学，若将此用于中国官场，则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们知道曾国藩推崇程朱理学，善以儒家传统律己、治军、为官。前些时候的“曾国藩热”或与此相关。我早说过，文学馆从不赶浪头，我们只严肃地讲学术。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难以一言以蔽之。

一、曾国藩和理学

曾国藩的一生治学博杂，对义理、考据、词章、经济乃至诸子百家各派学说，采取兼包并蓄的方针，其学业上的成就并不在理學上，而在古文和书法

悲情晚清四十年

Beiqing Wanqing Si Shi Nian

方面。但他却始终以理学为核心,其为人处事亦无不以理学为指导。所以,不少人往往把他看做理学家,并特别强调他早年就追随唐鉴讲习理学。其实,他不只研究理学,他所推崇的宋儒,亦不是二程和朱熹,而是周敦颐和张载,对程朱和程朱理学反而有不少批评。严格讲来,他与唐鉴、倭仁那样的理学家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一)

曾国藩的家乡湖南,自南宋以来,理学一直在学术领域占据优势。省城长沙当时有两个最有名气的书院,一个叫岳麓书院,一个叫城南书院,其嘉道以来的几代山长(即主持)都是讲习理学的。曾国藩本人及其亲朋好友,如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人都在这里学习过,非就学于岳麓,即肄业于城南。湖南著名学者欧阳厚钧和贺熙龄,就是直接向他们传道授业的老师。在这种环境下,曾国藩不可能不受到理学的熏陶和影响。只是由于曾国藩当时正急于谋求功名,眼光完全局限于应试诗文,无暇顾及学问,所以未能从这里直接走上治理学的道路。

曾国藩其后走上治理学的道路,主要是受到唐鉴的影响。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历任检讨、御史、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他“潜研性道,宗尚闽洛”^①,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师士林中颇有声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曾国藩为了弄清做学问的门径,登门求教“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并说,“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尽精,则万不能通一经”。为了突出理学的指导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特别强调,“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还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诗文书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曾国藩听后顿开茅塞。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②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文集》),第四卷,第36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规。”^①可见，唐鉴对曾国藩之研究理学，的确起了指路人的作用。

曾国藩按照理学家模式修身养性，则主要是由于倭仁的影响。本来，在唐鉴向他介绍“读书之法”时也同时谈到“检身之要”。唐鉴说：“近时河南倭艮峰前辈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②希望他引为榜样，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同时进行。但曾国藩回去后却没有照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曾国藩向倭仁请教修身之道，倭仁告诉他“研幾功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幾功夫也，周子曰‘幾善恶’，《中庸》曰‘幾虽伏矣亦孔之招’，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以知幾’，皆此谓也。失此不察则心放难收矣”。还说，“心之善恶之幾与国家治乱之幾相通”。最后，倭仁要求他必须“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③倭仁的所谓“幾”，就是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的某种迹象，所谓“研幾”，就是抓住这些迹象加以认真研究，从而把握其发展趋势，权衡利害，加以解决。其解决办法就是通过静坐、札记等自省功夫和相互讨论，将一切不合圣道的杂念消灭于刚一“闪念”之时，以使自己的思想沿着“圣人贤人”要求的方向向前发展，并将学术、心术、治术联通一气，通过学问的增长和道德修养的提高，逐步体验和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这就是理学家一套完整的修、齐、治、平理论。

此后，曾国藩就开始按照倭仁的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每天阅读《朱子全集》后，静坐自省，对照检查，写出心得体会，并与吴廷栋、冯卓怀、陈源兖等人交流。曾国藩还经常把自己的日记送请倭仁批阅。这一时期的日记上留下不少倭仁的眉批，多是一些批评、鼓励之语。曾国藩通过同唐鉴等人的交往，大大提高了在士林中的声望，不少人慕名拜访，切磋学问，理学家之名传遍京师。他自己也踌躇满志，以为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成为一位大学问家了。他在信中对诸弟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以下简称《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1页。

② 《曾文正公手书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③ 《曾文正公手书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之先导。”^①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②可见唐鉴等人对曾国藩鼓舞之大，影响之深。他的门徒们后来所说的曾国藩“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③，即是指此而言。

(二)

曾国藩治学虽然受唐鉴影响很大，但却并不像唐鉴那样独崇程朱，而是由程朱溯流而上，学习周敦颐、张载、欧阳修、韩愈乃至司马迁，并尊奉孔、孟、周、张为儒学正统，将程朱理学和许郑汉学一概归之于不无偏颇的支流旁系。他在一封书信中评论儒学各派并申明自己的志向时说，学问“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且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而自己治学则“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④他甚至将“文周孔孟之圣”与“左庄马班之才”相提并论。当刘蓉指责他不应该推崇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时，曾国藩复信反诘说：“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迂之书愤懣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⑤这些观点与唐鉴、倭仁显然不同，而与桐城派则较为接近。

到了晚年，曾国藩连理学究竟有多大实际作用也产生了怀疑。有一次，他与赵烈文闲聊。当赵谈到春秋以来人心不正，淫乱成风，“纳人心使日就范围亦宋儒之功”时，他立刻反诘说：“古人再醮为常事，今并有未嫁守节者，然桑濮之风亦不绝，论其优劣何如？”赵说：“互有长短。”曾笑着说：“允哉，断狱也。”^⑥意思是，赵的评判是公允的。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宋代以来理学在所谓“正人心”方面并没有人们所吹嘘的那种神奇作用。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②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③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年谱》（以下简称《曾文正公年谱》），第一卷，第6页。

④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4页。

⑤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4页。

⑥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日。

有时,曾国藩甚至对理学和理学家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厌恶情绪。同治六年(1867年)冬,曾国藩连遭言官弹劾,不得不辞去钦差大臣职务,离开剿捻战场。他的好友郭嵩焘也因不谐于舆论而失掉广东巡抚之职。于是,二人同病相怜、互相唱和,对当时的理学和理学家进行了猛烈抨击。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复信中说:“尊函痛陈自宋以来言路之蔽,读之乃正搔着痒处。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列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祐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长短,乃较王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学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仆讷君子攻击惨毒而已。”^①仅从这几句话看,似乎曾国藩从来就不是一个“谈性理者”,倒像是一位“性理之说”的受害者或一贯反对者。如果不是同治八年(1869年)那篇《劝学篇示直隶士子》鼓吹“为学之术”、“莫急于义理之学”的杰作,很可能被人误认为他早已同理学分道扬镳了。

(三)

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的态度与唐鉴不同,其对词章、汉学、经济乃至诸子百家亦无程朱学派的门户之见。

追随唐鉴讲习理学之初,曾国藩对唐鉴“重道轻文”的观点就未能接受。虽然唐鉴公然宣称诗文词曲皆小技,不必用功,而他却对之不能忘情。他在给刘蓉的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②自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过于劳累而大病一场之后,曾国藩愈益将主要精力用于古文诗词,再不仿效唐鉴、倭仁搞什么静坐、札记之类修身功夫了。一年之后,他在信中告诉诸弟:“余近来读书无所得,”“唯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所成就。”^③数月后,他又更为自信地说:“若如此做去,不做外官,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④

对于汉学,曾国藩也下过多年的功夫。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秋之

① 《曾文正公书札》,第二十六卷,第1页。

②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12页。

③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④ 同上书,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交，曾国藩在京师城南报国寺养病，携带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一部，准备随手翻阅。恰好汉阳刘传莹也住在这里，他对考据学颇为熟悉，曾国藩便向他请教。刘传莹亦正为考据学“无当于身心”而感到苦恼，遂转而向曾国藩学习理学。于是，二人朝夕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结为好友^①。从此，曾国藩对汉学经常进行学习，把学会文字训诂作为理解儒学思想真谛和写好文章的前提，不仅本人对此坚持不渝，并时常拿这番道理谆谆告诫子侄。

程朱学派不仅视词章之学为雕虫小技，而且对汉学的攻击尤不遗余力，有人甚至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归之于汉学。曾国藩认为，这都是门户之见，应该加以摒弃。他主张对儒学各派兼取各家之长，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者不可缺一。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的见解和志向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吾“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②。他的门徒黎庶昌在为他作传时说“始公（指曾国藩）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词，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辰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尤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③。这些话基本上反映了曾国藩的治学主张和经历。

对于经济之学，曾国藩也非常重视。当时一般学者多视经济之学为做官术，不把他当成一门学问。所以，姚鼐、唐鉴都认为学问只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曾国藩则把“经济之学”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词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今世掌故皆是也。”^④曾国藩认为，“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佑之《通典》、马端临之《通考》始，“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⑤，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所以，考据学的任务不仅在于文字训诂，更重要的是对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早在

① 《曾文正公年谱》，第一卷，第14页。

②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4、6页。

③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第三卷，第1页。光绪十六年。

④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杂著》），第四卷，第4页。

⑤ 《曾文正公文集》，第三卷，第24页。

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就在日记中表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研究这些问题,“皆以本朝为主而上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于简易。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代可知也”^①。事实上,曾国藩对“经济之学”也确实下过一番苦功夫。他大约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担任礼部侍郎前后起,一生中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济之学”,并从中吸取了历代统治阶级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经验,从而解决了一连串的社会实际问题,为其在反革命生涯中取得某些成功提供了重要条件。

曾国藩不仅对儒学各科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而且对诸子百家也采取兼收并用的方针。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虚静,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②又说:“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③有时,曾国藩甚至干脆把先秦诸子的各派学说称之为孔子的“言外之意”。他说:“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天不由人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④

曾国藩在其一生的活动中,从诸子百家各派学说中吸收了不少思想用于行政和为人处事。例如,他在湖南举办团练时,就吸取刑名家重法治乱世的思想,作为残酷镇压农民群众反抗活动的理论根据;他在统治阶级中受到排挤时,就吸取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动“推让少许权利”,以解除清政府的疑忌。结果,他在这两件事上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否则,湖南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广西,使他无立足之地,更难以取得以后的成功,即使把太平天国革命

① 曾国藩:《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一日。见台北影印《湘乡曾氏文献》,第6册,第3369-3370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以下简称《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20页。

③ 《曾文正公手书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④ 《曾文正公手书记》,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四日。

镇压下去,他也未必能“保全末路”。这对他来说可谓受益匪浅。

由于以上这些特点,曾国藩常常受到一些正统理学家的“讥议”。清朝末年,有位学者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湘乡(指曾国藩)训诂、经济、词章皆可不朽,独于理学则徒以其名而附之,非真有镜于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罗罗山之所讲论者,其终身所得,‘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耳。”又说:“儒者学孔孟程朱之道,当独守孔孟程朱,不必以混合儒墨并包兼容为大也。”“以杂为通,以约为陋,以正为党,博学多能,自命通人,足以致高位取大名于时而已,不当施之于讲学。”“湘乡讥程朱为隘,吾正病其未脱乡愿之见耳。”^①显然,这位独尊程朱的道学先生是不承认曾国藩为理学家的。这固然反映了程朱学派的门户之见,而同时也反映出曾国藩的治学特点。

(四)

曾国藩虽然早年以理学出名,但兴趣最大的是古文诗词,即“词章之学”。他在家信中说:“余生平好续《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②又说,“余在道光廿二、三、四、五等年用胭脂圈批的各书中,唯有《史记》、《韩文》、《韩诗》、《杜诗》、《古文辞类纂》、《震川集》、《山谷集》数书首尾完毕”,“余皆有始无终”^③。上面提到的这些书,基本上属于古文类,没有一本是经书或理学家的著作,即如《史记》、《汉书》、《庄子》等史学或哲学名著,曾国藩也是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的。对于所谓经史书、宋五子书,他似乎并没有下过太大的功夫。咸丰八年(1858年),他在信中对长子曾纪泽说:“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涂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体,遂至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④其后,曾国藩大致学会辨认天体星象,书法也大有长进,唯经学的学习进展迟缓,直至很晚才将主要经书读完。

曾国藩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的亦是古文诗词。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困守祁门,形势万分危急,深感性命难保。他在遗嘱中对长子曾纪泽说,“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

① 夏震武:《灵峰先生集》,第四卷,第13页。

② 《曾文正公家书·家训》,咸丰六月十一月初五日。

③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家训》(以下简称《曾文正公家训》),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④ 《曾文正公家训》,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